

叶剑英研究丛书



叶剑英 与 毛泽东



广东叶剑英研究会
广东叶剑英基金会

叶剑英研究丛书

叶剑英与毛泽东

叶文益 著

广东叶剑英研究会

广东叶剑英基金会

封面设计：易 立

叶剑英与毛泽东

叶文益 著

出版：广东叶剑英研究会

广东叶剑英基金会

承印：佳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5 字数：25.5 万字

印数：300

2001 年 7 月第一版，200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粤印准字第 0166 号

如印装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调换

叶剑英研究丛书编委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 问：	王文理	王守江	刘田夫	陈越平
	杨应彬	张廷栋	林 若	逢先知
	郭荣昌	梁威林		
主 任：	郑 群	张江明	范 硕	
副主任：	孔庆榕	杨建成	陈弘君	
	郑世铨	黄桂清	梁渭雄	
委 员：	叶文益	李志业	杨 清	
	陈登贵	郭 明	黄子云	
	章权才			

引 子

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位大写的人，也是一本读不完的教科书。他的人生经历可以展现出整个时代历史风云。然而，也有人说，毛泽东与他的战友、同事之间的共事交往，也是一则则充满着传奇色彩的感人故事，也是一个个常讲不衰的“热门”话题……

一个成功的世纪伟人的背后，必定拥有许许多多志同道合的追随者和支持者。毛泽东也不例外。在毛泽东身边众多的战友、同事当中，叶剑英就是一位颇为得力的助手。数十年来，叶剑英追随毛泽东南征北战，长时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亲聆其谆谆教诲，使他深受教益。他从双方共事交往中认识毛泽东，也从双方共事交往中了解和熟悉毛泽东，并从心底里敬佩毛泽东，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毛泽东。无论是在风云变幻的江西中央苏区，还是在充满着激流险滩的长征路上；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岁月里，还是在和平建设的年代中，叶剑英都一如既往，至真至诚，竭力辅助毛泽东，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和器重。叶剑英与毛泽东数十年来的交谊轶事，给后人留下了美谈佳话。

让我们撩起岁月沉重的帷幕，一起追溯叶剑英与毛泽东之间从相识到相知之往事，一起领略叶剑英与毛泽东在其共事交往中确立的诚挚情谊……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耐人寻味的“同龄人”	(1)
一、共同的志向：救国济民	(1)
二、相似的生长环境	(5)
三、都是“文史之学”的爱好者	(7)
四、迥异的报国之路	(13)
第二章 相会在中央苏区	(17)
一、同立在大革命的潮头	(17)
二、历史的转折关头	(19)
三、“拜毛泽东为师”	(26)
第三章 统帅与“参座”	(30)
一、帅帐中的得力“参座”	(30)
二、来自第一线的建议	(38)
三、发挥参谋作用	(43)
第四章 同舟渡难关	(47)
一、拥护遵义会议决定	(47)
二、开路先锋	(50)
三、“川西传讯”	(54)
第五章 “东扩”的日子里	(62)
一、毛泽东力主东征	(62)
二、中路军总指挥	(66)
第六章 特殊的使命	(71)
一、出使西安	(71)
二、营救西路军人员	(78)

三、南京——武汉——南岳——重庆	(82)
四、“叶剑公舌战群儒”	(89)
五、语重心长的教诲	(93)
六、创办华北军大	(95)
第七章 开国领袖与北平市长	(100)
一、首任北平市长	(100)
二、亲迎毛泽东进入北平	(106)
三、“双清别墅”的见证	(111)
四、新的战斗任务	(114)
第八章 解放华南	(118)
一、“走马”上“新任”	(118)
二、决策赣州城	(121)
三、“攻粤”与“入桂”的分歧	(123)
四、逐鹿天涯	(129)
第九章 京粤之间	(135)
一、主政广东	(135)
二、发展经济新举措	(140)
三、毛泽东的忧虑	(144)
四、加强海南岛战备工作	(151)
五、土改起“波澜”	(155)
六、历史的公正评价	(163)
第十章 “统筹两广”	(174)
一、毛泽东电催叶剑英赴桂	(174)
二、“统筹两广”	(179)
三、建议“托管钦廉”	(182)
第十一章 共谋“强军”之策	(187)
一、尽心尽力的训练总监	(187)
二、重视军事科学研究	(194)
三、加强军队院校建设	(200)

四、走军队现代化之路·····	(206)
第十二章 大动乱的年代·····	(213)
一、老帅发怒：军队不能乱·····	(213)
二、毛泽东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219)
三、“国际形势座谈会”·····	(222)
四、临危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224)
五、竭力整顿军队·····	(228)
第十三章 不寻常的 1976 年·····	(233)
一、频繁的灾异变故·····	(233)
二、毛泽东临终前的无声嘱托·····	(241)
三、小丑的最后疯狂·····	(244)
四、剷除“四人帮”毒瘤·····	(248)
第十四章 战友与诗友·····	(256)
一、“剑英善七律”·····	(256)
二、旨趣相谐尽诗中·····	(264)
第十五章 叶剑英评价毛泽东·····	(270)
一、叶剑英评价毛泽东的业绩·····	(270)
二、叶剑英评价毛泽东的思想·····	(277)
三、叶剑英评价毛泽东的精神·····	(285)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294)
后 记·····	(297)

第一章 耐人寻味的“同龄人”

一、共同志向：救国济民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一位全球瞩目的“东方巨人”；

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一位被称为“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的一代“儒帅”。

叶剑英和毛泽东，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都是举足轻重、有巨大影响的人物。他们都曾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付出了毕生的心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世纪伟人毛泽东生于 1893 年，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生于 1897 年，两人相差仅 4 岁，可谓是“同龄人”。然而，倘若追溯他们的身世，竟令人惊奇地发现，他们二人的家庭背景、生长环境、旨趣爱好，以及青少年时代的人生际遇等，均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饶有情趣，耐人寻味。

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毛泽东“出道”比叶剑英早得多。毛泽东从 17 岁进入湖南省立师范读书开始，就关心政治。他亲闻目睹了列强入侵，国土破碎，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深感到帝国主义的凶恶，军阀政府的腐败，于是树立起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观念，决志改造社会、建立新的国家。此后，他逐渐走上社会寻觅救国救民之真理。当毛泽东为筹建中国共产党组织而四处奔走，并成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时候，叶剑英还只是一位刚刚走出云南讲武学校不久的热血青年。

作为“同龄人”，叶剑英与毛泽东形成人生观的青少年时期，中国正处于“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多事之秋。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其“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

国门，清政府往日的“天朝威仪”丧失已尽，国势日蹙。尔后，随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于是，中国正在遭受西方殖民者的疯狂侵略和掠夺，晚清政府和北洋军阀却软弱无能，隐忍迁就，丧权辱国，致使民族危机深重，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

每个人的青少年时代都有着自己的梦想。毛泽东和叶剑英也不例外。他们生长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都较早地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志向。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久有凌云志，胸怀大目标。他有一颗“心忧天下”的飞扬的灵魂，胸怀伟大抱负，立志寻求“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正是由于有着这种大境界、大抱负，他也能成为一位历史的伟人。对于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青年毛泽东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没有顺从父亲的意愿，去做一个会记账、会打算盘、继承家业的小财东，而是胸怀救国济民、改革社会的“鸿鹄大志”，渴望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种能施展个人才华的新天地。因此，他决心走出韶山冲，外出求学，立志干一番大事业。毛泽东从小就关心国家命运，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他自从进入湖南省立师范读书以后，就关心政治，思考社会问题。他从表兄文运昌处看到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等书后，深受影响，激发起强烈的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尔后，毛泽东又读到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书，该书开头就有“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不足十字的一句话，深深地刻印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民族的危机，国家的衰亡，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增强了他的忧患意识，明确产生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

1915年5月，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同班同学易昌陶，因病早夭，毛泽东曾写过一首长达40句的五言古体挽诗，诗曰：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踟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
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瀣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飏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屿，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这是一首典型的借悼亡友抒国愤的五言挽诗。尤其是“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这四句，更是抒发了作者毛泽东忧国忧民、救国济民的志向和抱负。毛泽东写此诗时，正值日本以赞同袁世凯称帝为诱饵，要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并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政府竟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震动，舆论哗然。在这种背景之下，毛泽东借悼亡友抒国愤：东边隔海相望的日本鬼子，北边山水相连的是沙皇俄国，都是与我们为敌的侵略者，谁来扫荡这些妖魔鬼怪？就靠我们这一代。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出身低下贫贱，就不去担当这救国济民的重任。当时，湖南第一师范的师生曾将国内知名人士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为《明耻篇》。毛泽东

读后，曾在其封面上愤然挥毫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7年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更是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职志，深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尽管此时他还是一位身无分文的穷学生，但时代与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却使他胸怀宏志，“心忧天下”，因而发出了“鲲鹏击浪从兹始”的铿锵誓言。此后，在1925年，已是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独立湘江桔子洲头，写下了《沁园春·长沙》。在这首词中，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抒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壮志豪情……

而比毛泽东小4岁的叶剑英，少年时期也已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激发出爱国爱民的思想。他12岁时，进入梅县丙村三堡学堂就读。在学期间，正值孙中山领导的“推翻帝制”的斗争正酣之际，三堡学堂里有一位进步青年教师林修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经常在学生中间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针砭时弊，抨击朝政，并讲述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故事。这些都使叶剑英深受影响，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熏陶，逐渐萌发了憎恨腐恶势力，立志匡救中华的思想，开始有了向往大同世界的强烈渴望。1915年，18岁的叶剑英也曾写了《油岩题壁》诗一首：

放眼高歌气吐虹，
也曾拔剑角群雄。
我来无限兴亡感，
慰祝苍生乐大同。

叶剑英有感于外患频仍，内乱不止，国难当头，危机深重，决心立志从戎，效法“拔剑角群雄”的爱国志士，拯救百姓，报效国家，驱除腐恶势力，实现康乐的“大同世界”。

常言道：诗言志，歌寄情。叶剑英的《油岩题壁》一诗，其诗句出自作者胸臆，述怀言志，托意深远，气势恢宏，格调高雅，充分表现了叶剑英救国济民的伟大抱负和崇高志向。从这首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年仅18岁刚刚成年的叶剑英，已经初步确立了民主

革命的信念和世界大同的理想。这也是他日后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根基。

正值中华民族处在岌岌可危之际，叶剑英和毛泽东目睹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严酷现实，一个喊出“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一个要“拔剑角群雄”。这都是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热血青年正确抉择。也正是这种伟大的抱负，共同的志向，使叶剑英和毛泽东有了自己明确的人生坐标，那就是为“拯斯民于水火，扶华夏之将倾”而尽匹夫之责。

纵观叶剑英和毛泽东的一生，从少年时代起，他们就开始萌发了为挽救民族危亡、为解除人民苦难的人格意识；到了青年时代，他们又为匡救中华、为民造福的理想追求而付之实践。也正是这种人格理想的追求，使他们后来都成为了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脊梁，成为了人民的领袖（最高统帅）和人民的元帅。

二、相似的生长环境

艰难的生活环境能锻炼人、磨砺人。叶剑英和毛泽东均为农家子弟，都出生在农村。自从青少年时代起，他们就分担了家庭生活之重担，帮助自己的家人躬耕垄亩，操务稼穡，在农村的环境中生活、成长。朴实辛劳的农家生活的磨炼，使他们自幼便养成了对土地、庄稼以及劳动人民的一种朴素的亲切感、尊崇感和认同感。

叶剑英出生于粤东梅县山区农村的一个小商家庭。其全家生活来源除了仰赖耕垦农稼维持外，他的父亲还兼营小摊贩生意，母亲也经常为了生计给人打零工，以获取一点收入应济家用。在叶剑英出生前后，家庭经济就已经每况愈下，一日不如一日。其父亲的小本生意难于支撑维持，家中经常缺粮少米。父母生下8个孩子，因为贫病交困，有4个孩子不幸夭折。即使是勉强活下来的两个妹妹也被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家境的贫寒，生活的艰辛，使叶剑英

亲身感受到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在他的心田里从小就埋下了要求改变旧社会的种子。

而毛泽东的成长环境，与叶剑英也颇为相似。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6岁时就已开始下地干活，种田、放牛、养猪等什么活儿都干。直至8岁时始能上学，但早晚还要下地帮助家人劳动。刚刚学会几个字，其父亲就要他给家里记帐。有时没有帐要记，就得帮家人干农活。后来，毛泽东到了其母亲娘家住的湘乡县一个新式学堂读书，“因穿着比别人寒酸”，常被“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精神上感到很压抑”。由于吃过了苦头，尝到了人间的艰辛，所以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对贫苦农民也怀有着特殊的感情。

同是出生于农村，从小就在颇为相似的农村这一成长的环境中生活，叶剑英和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都比较了解与熟悉。他们亲眼目睹了农民斗争的事件，也体察和感受到农民的苦难，因而都十分同情农民们的各种遭遇。1910年4月，湖南发生粮荒，长沙饥民为生活所迫，聚集于湖南巡抚衙门前示威，要求平粜赈灾，巡抚不但蛮横地拒绝农民之要求，反而对农民施行镇压，许多人遭捕杀，“斩首示众”。毛泽东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响了我的一生”。此后，我始终忘不掉这件事。“我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老百姓，对于他们受到冤屈，我深感不平”^①。而叶剑英从小对那些官府豪绅欺负老百姓的“不平之事”，也常鸣不平，甚至出手相助。叶剑英的家乡梅县丙村镇地处潮州至梅县之间的河道岸边。晚清时期，清政府派驻潮州的官兵乘船路过，经常到丙村镇敲榨勒索，劫掠财物，寻衅滋事。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些胸前绣着“勇”字的清兵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但又不敢得罪他们，敢怒不敢言。其时正在中学念书的叶剑英，目睹着此情此景，极为愤慨。他在校长的支持下，邀集了几位个子较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第110—111页。

大的同学，将抢掠民物的清兵痛殴了一顿，为当地受欺负的老百姓出了气，人们无不拍手称快。时称为“打潮勇”事件。此事至今虽已远隔数十载，但在当地老百姓中间仍津津乐道，传为美谈。

非常明显，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叶剑英和毛泽东，作为农民的儿子，从小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普通劳动人民的疾苦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们从小就同情贫苦人民，对那些欺压农民的事情，往往心感不平，甚至还挺身而出，仗义相助。这些都为他们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都是“文史之学”的爱好者

叶剑英和毛泽东除了从小都有伟大的抱负、共同的志向、颇为相似的生长环境之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偏好“文史之学”。

青少年时代的叶剑英与毛泽东一样，都十分酷爱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对“文史之学”更是情有独钟。他们都是“文史之学”的癖好者、痴迷者，都对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产生有深厚的“情结”。

众所周知，毛泽东素来以勤奋好学而为世人所称颂。他从小就十分喜爱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①。毛泽东曾经说过：“读书是我一生的爱好。”此话的确一点也不假。这可以从毛泽东故居所藏的数万册藏书得到充分的佐证。毛泽东从8岁进入私塾开始，就很系统很用心地熟读了《三字经》、《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旧学经书，琅琅上口，经久不忘。青年时期，毛泽东选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史书。对于历史人物传记，包括中国历个朝代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如陈涉、吴广、张角、张鲁、王仙

^①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第196页。

芝、黄巢，直到李自成等的传记，他都非常喜欢看。^①到了晚年，虽然年老体衰，视力减退，但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精神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欲望仍十分强烈。1975年，他的视力有所恢复后，又重读《二十四史》。^②读史成了毛泽东整个读书生活的重要部分，真可谓是“嗜书若命，嗜史成癖”。

毛泽东常说的一句中国俗话：“活到老，学到老。”他以自己的实践，实现了他的诺言。据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同志说，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

毛泽东平时不仅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研读各种旧书古籍，而且尤为可贵的是，他在阅读时能够做到口诵心解，领悟透彻。他读得十分认真，又肯动脑筋，勤于思考，既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也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崇信盲从。正因为他对中国古籍（尤其是文学、历史书籍）怀有浓厚的兴趣，故文史古籍读得比较多，既广泛涉猎，又精读深究，因而他的“文史之学”知识渊博，功底深厚。他不但是对中国历史有很深造诣的学问家，而且也是驾驭历史、古为今用的大师。人们只要翻阅毛泽东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对历史成语典故运用自如，贴切恰当，生动通俗，发人深省。毛泽东的语言表述，本来就很风趣而又富有幽默感。平时他做报告或讲话，经常引用历史成语典故。他对历史成语典故多是随口而出，娓娓道来，令人听后倍加几分亲切感，从中深受启迪和教益。

说起毛泽东“文史之学”深厚的功底，还得感谢其业师袁吉六老先生。在毛泽东求学的众多老师中，袁吉六先生曾执教他5年半国文，对他影响颇大。毛泽东后来一直都惦记着这位助其学业玉成的博学多闻的老师。

那是在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就读期间，袁吉六是毛泽东所在的班级的国文教员。袁吉六为举人出身，通晓古今文史，学识

①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第202页。

②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出版，第17页。

渊博。他执教湖南一师“教声颇好”，治学严谨，讲解精辟，思想开明，关心学生，谆谆善诱，深受学生欢迎。当时，袁吉六在对毛泽东施教的过程中，发现毛泽东立有救国救民之鸿鹄大志，而且学业成绩优秀，故对毛泽东非常器重，精心调教。毛泽东初入学期间，曾一度模仿梁启超的文风，多以新闻记者的手笔撰写文章。袁吉六发现后对毛泽东作了认真的纠正，并要他以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为楷模。毛泽东听从师训，开始潜心研读韩愈的著述，效仿“韩派”之文风，并学会了古文文体。平时，袁吉六还向毛泽东授以读书方法，介绍他阅读一些好的古典文学作品。他还将自己读书的好方法传授给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文章妙来不过熟，要多写、多记、多想、多问。我自己就是用这个法则提高的。”^①毛泽东后来养成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就是深受袁先生的影响所致。自那以后，毛泽东凡是读书，除了在书中圈点、批注外，还坚持写读书笔记，将自己读书时的心得、认识、见解等记录下来，既积累知识，又助增记忆，效果显著。

对于业师袁吉六先生的教诲和影响，毛泽东感触良多，印象深刻。1936年，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在谈到在湖南省第一师范读书时所受的影响时，毛泽东曾这样说：“学校里有一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起了‘袁大胡子’（当时袁吉六在一师教员中年龄最大，且留有胡子，故师生们美称‘袁大胡子’——引者注）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②毛泽东在自己写的《自传》中也说：“予之得窥古文涯涘者，袁胡之教为多。”^③有一次，毛泽东与同学周世钊交谈时也说：“我能写古

① 符富全：《毛泽东业师袁吉六》，载《湖南党史》，2000年第4期。

② 符富全：《毛泽东业师袁吉六》，载《湖南党史》，2000年第4期。

③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出版，第121页。